

内部参考 请勿外传

外国新闻事业资料

1979年 第1期

(总第3期)



复旦大学新闻系

外国新闻事业资料

1979年第1期 目 录

(总第3期)

“社会责任论”论点种种

.....〔美国〕艾尔弗雷德·A·克罗威尔(1)

自由和负责的新闻事业(史料).....(17)

日本公众传播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日本〕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 内川芳美(19)

二次大战以来美国新闻事业概貌(下)

.....舒宗侨(26)

美国报纸的两重性及其弊病

.....〔美国〕乔治·L·伯德·弗雷德·默文(39)

国际新闻界:

西欧报刊集中的趋势

.....〔法国〕G·加提诺(42)

拉丁美洲新闻界概况

.....〔东德〕马里达·罗达·派纳(48)

广播与电视:

报刊、广播与电视的分工

.....〔波兰〕沃尔利·皮萨里克(53)

美国对外宣传机构的改组

.....〔苏联〕S·葛利亚科夫(60)

新闻写作:

精心写好新闻导语

.....美国《全能的记者》(63)

图片选载:

“难忘的新闻照片”

.....(68)

报刊介绍: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简介

.....居延安(74)

新闻教育:

两个德国的新闻学和新闻教育

.....〔西德〕曼弗尔德·吕尔(77)

动态:

苏联继续讨论新闻现实性问题

.....苏联《新闻工作者》(82)

外国新闻事业动态

.....(85)

史料:

美国新闻事业简史(中)

.....〔美国〕B·D·柯契兰(89)

美国资产阶级新闻理论

“社会责任论”论点种种

〔美国〕艾尔弗雷德·A·克罗威尔 郑北渭译

译者按：以下译自美国马里兰大学1975年再版本《创造性的新闻编辑工作》教科书中阐述美国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一篇文章。原作者把有关社会责任论的许多谬论摆了出来，总的观点是：美国报刊既享有宪法保证的新闻自由，但也要对社会负责，报纸要自我改进，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文中还涉及报纸与政府的关系、客观报道以及新的新闻学流派新兴新闻学等问题。

社会责任论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它是对过去“新闻自由、超然独立、监督政府”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新闻学的重大修改；主张新闻事业要对社会负责，指出美国宪法保障新闻自由，但报纸要珍惜这种自由，要实行“有控制的新闻自由”，政府要“干预和控制”新闻事业。实际上这种理论是打着对社会负责的旗号把以前对报纸老板个人负责变为对整个垄断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制度负责罢了。

文中提到报纸的职能，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提供公众事务方面的新闻、讨论和辩论，为政治制度服务。”这个

自我表白，一语道破了对社会负责的虚伪性。何况，今天，在资本帝国主义的美国，由于日益兼并的结果，新闻事业大都集中在垄断资产阶级手中，所谓对社会负责就是对整个垄断资产阶级负责，把一个阶级的私利冒充为全民的利益，企图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再清楚不过了。

按照“社会责任论”，为了显示对社会负责，有些资产阶级报刊也抨击美国政府的某些政策措施，揭露、批评总统的丑闻，以及其它高级官员的所作所为，或道貌岸然地提倡社会改革，这一切实际上统统是小骂大帮忙的表现，始终以免危及资本主义剥削为界限。表面上反，实际上是保。美国报纸与现行政治制度及政府并不对立，恰恰相反，报纸企图通过上述种种作法，来维护现行制度。在美国新闻史上，报纸宣传中丢卒保帅，牺牲局部与暂时的阶级利益以保全整体与根本的阶级利益的作法是常见的。揭开对社会负责这块面纱，其虚伪性就昭然若揭了。

“社会责任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在新闻事业中的必然产物，其实质是帝国主义加强思想、新闻控制，为对内加紧压迫剥削，对外侵略扩张服务的。

社会责任论

沃尔特·李普曼（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已故）曾在伦敦举行的国际报纸研究协会上说，在庞大复杂的社会里，自由报刊是社会必需的有机组成部分。他说：“如果没有自由报刊供人们互通消息，开展议论和批评，人们是无法生活的。”

李普曼又说，“报纸应该有所主张，但也必须要有反驳的意见。”这里，他指的主张只能放在社论、专栏和述评里，而不是放在客观的新闻报道里。

这就是报纸的社会责任论，就是新闻学院进行教学以及西奥多·彼得森在《报刊的四个原理》里论述过的社会责任论。从事实际工作的新闻工作人员难得去操心这种理论问题。他们能准确、负责地进行报道，使报纸予以采用，便感到心满意足了。然而，李普曼却谈了美国报刊在本世纪里为什么要根据社会责任论进行工作：

“在这个庞大复杂的社会里，美国政府必需取得人口相当高的比例即60—75%人民的同意，否则，有争议的法律是无法顺利执行的，新制订的政策也无法付诸实现的。

“庞大复杂社会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它不是单一的社会，因而不能进行拢而统之的计划或指挥。庞大复杂的社会是由多数人组成的社会，它包含着本地区的、区域性的利益、活动和组织。

“为使许多人组成的社会进行活动，必须提供大量的情况资料，但光是原始资料还是不够的。它们不能说明问题，它们必须经过政治分析家、财经分析家、戏剧评论家与书评家等等的反复解释以及综合分析才能说明问题。”

报纸的职能

彼得森认为，根据社会责任论，报纸的职能是：

- 1、提供公众事务方面的新闻、讨论和辩论，为政治制度服务；
- 2、教导公众，使能做到自治；
- 3、监督政府，保护个人各种权利；
- 4、为经济制度服务，主要是通过广告媒介，沟通买卖双方，促进商品与服务的流通；
- 5、提供娱乐；
- 6、报纸保持经济自给，免受各种特殊财团的压力。

报纸的这些职能与过去自由主义者所提出的职能如出一

辙。但是，社会责任论者对公众传播工具的某些业主在报纸职能的解释上以及有些报刊的做法进行了谴责。

社会责任论者认为，报刊并没有很好地做到为政治制度服务，教导公众，并且保护公众的各项自由。这种社会责任论把报刊为经济制度服务贬为第二位，把它放在促进民主政治与教导公众之后。至于所提到报刊的娱乐作用，那是指“高尚”的娱乐而言。社会责任论者还认为，公众的报刊应该做到经济自给，但是某些公众传播工具则可例外，不必赚钱自给。

报刊“没有履行职责”，即失败了，让我们看一下报刊是怎样应用社会责任论的。

作为一种既成体制的美国报业，愈来愈多的主编把发表重要事实对个人与社会的影响加以客观的考虑了。在为庞大复杂的社会公众服务中，准确性和责任心成为美国报纸的座右铭。他们认为不应刊登所有事实。例如：

合众社驻伦敦记者菲利普·奥尔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收到关于日本投降的电讯后便赶往英国外交部新闻司，要求官方发言人发表反应。奥尔特写了一个导语，采用发言人的原话：

伦敦(合众社)——英国外交部发言人被告知日本已经投降时说，

“好啊！”（译注：注意官方发言人用的英语是儿语，“好啊！”）

奥尔特琢磨了一会，认为这样发表的话，便会大大影响英美同盟的关系，因此他就把稿子扔到字纸篓里了。

报纸的地位

为摆脱政府、政党和广告户的控制和检查，报纸在新闻工作的职业化方面有很大的改进。在报纸成长的斗争中，人民了解新闻的权利与政府当局扣压新闻的权利之间的矛盾，

报纸并没有找到解决矛盾的原则。两种权利必须共存下去。

另一对矛盾是：报道犯罪与惩处的新闻时常与司法部门发生矛盾。对于以上这两对矛盾中的任何一对，我们还远未解决。

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报纸编辑工作还属一种次要技艺。那时认为，只要跟着编辑学艺，便自可学会。这种非正规的、粗糙的作法把那时以来的进步似乎一笔勾销了。可是，在庞大复杂的社会里，对自由报刊职能的要求则又愈来愈高，以至今天，美国报刊没有比过去任何时候被误解、挨批评了。

新闻工作仍然落后于其它职业，表现在以下方面：

- 1、它的系统的知识与学科；
- 2、它的组织与社团；
- 3、它的职业道德准则。

在这个繁荣的时代里，美国报纸虽然近来已经成为美国既成体制中的一个新的青年成员，例如拥有大宗广告和自动化电子设备，但在我们繁荣的社会里，甚至新闻的定义正在起变化，连报纸的职能也还正起着变化。

李普曼说过，新闻工作还是一门“发展中的职业”。他说：“新闻工作者常被看作——粗略地说——属于理发师和骑师一档的人员，正象外科医生和音乐家在一个世纪之前被看作的那样。”

《华盛顿邮报》宣称，美国报纸“出身寒微”，力争上游（它经历了政论小册子时期、党派报纸时期与主编个人办报时期）。美国报刊现在渴望获得尊重、地位与影响。它要求人们的重视。首先，它要求得到信任，因为，在美国生活中，报纸的权力、影响与地位全都建立在可信性的基础上，这种基础是独一无二的，也是脆弱的。

但是，在公众心目中，美国报纸的真诚与诚实降到新的低点时，它又怎能得到人们的尊重呢？有一个诺曼·艾萨克斯的人在休斯敦大学新闻讨论班上对采访食品工业的记者说，美国报纸正陷于严重困境，因为“大多数美国人不再相信报纸了”。人们不信任报纸是“因为过多报纸有它们自己的一套看法，并筑了一堵使人怀疑的墙”。艾萨克斯说：“你们之中大多数还掉以轻心，你们应该负起责任来。”

莱斯特·马克尔说，美国报纸只有本身增强责任感，才能缩小可信性的差距。他说，“美国报刊依然面临着责任感的问题。只有主编和广播者才能解决，而不是靠法院、政府和公众去解决。”

繁荣的美国报业

美国报纸出版人协会宣称，美国所有1,749家日报在全国经济中占不小的比例。在美国所有企业中，新闻事业装用物资的价值列为第十位；雇用人员列为第五个最大的行业。事实上，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报纸雇用的人员增长了48.9%，较其他行业雇用的数字增长得快。在七十年代前期，报纸雇用大约373,000人。还有数以万计的人员从事报纸出版的有关产品的生产，如新闻纸、印刷机、计算机以及其它所需的物资。

美国报纸出版人协会还宣称，报纸广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增加了5倍，并且正超越整个经济成长的步伐。

广告方面，报纸获得了30%的广告费总额，与公众传播的其它工具相比，报纸是领先的。公众传播工具的所有广告费全年达205亿美元，报纸占62亿美元，较上年多得4亿7千万美元。

就日益增长的需求来看，只有报纸才能提供有深度的、

详尽的新闻报道。协会解释说：“这说明为什么占全国人口 77% 的年满18岁的美国成年人，任何一天（星期一至星期五）都读一份报纸。他们通过报纸接触新闻大大高于通过其它公众传播工具。也说明为什么报纸达到了开创记录的 6 亿 2 千万份的每日发行数。”

报纸对政府的非难

有些报纸主编认为，过去的报纸对市政当局进行监督的新闻理论已经演变成为系统的对抗，报纸与政府之间成为一种对峙关系。根据报纸的社会责任论，反对政府无疑是容许的，然而当然不是必需的。

《华盛顿明星报》的克罗斯比·S·诺伊斯在他写的专栏里说：“反对政府，事实上已变成美国新闻工作的一条公理。”他说许多新闻工作者相信，美国宪法所规定的出版自由，使“第四等级”（译注：欧洲封建时代的三个等级指僧侣、贵族、平民。这里“第四等级”谑称新闻界。）的新闻界，成为对政府行使职权起牵制与平衡作用的一个有机部分。他们声言，独立的报纸代表着公众要求了解新闻的利益与人民权利，报纸所代表的权威性并不亚于被选出的官员的权威性。

他们认为，美国总统的记者招待会相当于英国议院的质询会，后者，首相受到反对派长时间的尖刻质问。但是，对于总统的记者招待会，总是有意识地把总统说得不错，因而记者们想方设法另找机会难为总统。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主编埃德温·D·坎汉在一次缅因州科尔比大学的伊莱贾教区洛夫乔伊授奖典礼上演说，“美国报纸具有与政府对立的、不能否认的作用，可能会导致报纸权力的不公正应用。”有些报纸评论家指出，报纸与

政府的对峙逼使报纸参与其中，把竞选运动中首位人物拉了下来。

《华盛顿明星报》诺伊斯说，人民了解新闻的权利并不等于坚持找政府麻烦，使政府瘫痪，或者甚至想破坏被选出来的领导。他还说，果真这样有步骤地做去，并奉之为原则的话，那么现实会被歪曲，最后，公众了解事情与事件的消息将是错误的消息。

对峙制度所引起的非人道作法

关于“对峙制度”所引起的非人道作法，《出版人协会辛迪加》的华盛顿专栏作家查尔斯·巴特利特在《鹅毛笔》杂志的文章里写道：

《时代》杂志封面刊登了一幅近摄人象，把受到围攻的参议员托马斯·F·伊格尔顿（被指控醉后驾车拘捕过）表现得很尴尬，像个发疯的白痴。还有，当伊格尔顿为自己的事业前途进行声辩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乔治·赫利曼在一次电视质询节目中问他为什么发抖、冒汗。最后，全国广播公司的巴巴拉·沃尔特斯在节目结束时间问他，回去后将怎样对儿子说。

但是，巴特利特说，这样粗暴地对待伊格尔顿，最后得利的是另一记者杰克·安德森。在星期日的电视质讯中，安德森的非人道行径发展到了顶点。

记者安德森向伊格尔顿承认，他并未发现他原先指控伊格尔顿的证据，因此向他表示歉意。伊格尔顿当场赞赏了安德森的勇气。接着，安德森突然出尔反尔，弄得伊格尔顿目瞪口呆。安德森表示，由于他还需进一步核实，他不能撤回自己的报道。

安德森解释说，他在伊格尔顿事件中的错误，是由报界各种竞争压力所造成的，结果使整个报纸的可信性大受影

响。诚如巴特利特所说：“公众对于报纸的反感，这件事再也典型不过了。为使读者痛快，不管多么卑鄙恶劣，不择手段的竞争到了疯狂的程度。”

公众传播工具虽然狠触灵魂地进行了自我检讨，但还没有恢复丧失殆尽的特性：良好态度、最起码要遵从人类的基本尊严，包括对政府官员的尊严，以及不时表示对人类的同情。公众传播工具迫到事件的核心时，切忌莽撞行为。

粗 鹫 的 作 法

报纸评论家威廉·L·里弗斯却认为报纸与政府间存在的对峙关系，倒恰恰是构成把政府报道好的基础。诚然，至少有些政治家和报纸表示，他们理解并接受这种关系。里弗斯的论据在于：政府官员或有人硬要发表那些记者认为是错误的、不准确或者没有新闻价值的东西；而记者则要刊登另外一些新闻来源不愿发表的材料。记者假如听命于新闻来源（例如接受现成的宣传品），那么他不是一个好记者。因此，有战斗性的记者是为获得他需要的答案和事实而斗争的，甚至不惜借助偷窃的手段，或者更经常的是同政府其它官员或官僚合作，以达到向公众泄露机密材料的目的。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报纸与政府对峙的矛盾中，新闻来源方面是具备某些防御力量与有利因素的。若干著名市长根本不理睬新闻界，不与记者搭话。官员们可以经常回避新闻界，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使记者们无事可干。新闻来源可以越过新闻界，取消记者招待会而通过广播电视与人民接触，也可以按麦卡锡（译注：采用法西斯手段迫害美国民主和进步力量的反动主张，五十年代由美国参议员麦卡锡提出。）方式或美国近来几个总统使用的方式来对付报纸。这样双方之间的斗争陷于僵局，报界被搞得嘀嘀咕咕，灰心丧气。这种

情况肯定不是“监督”政府，而是结成冤家。

毫无疑问，对报纸所受到的种种对待，公众感到厌倦，与官员们也疏远了，许多适宜于家庭看的报纸的可敬主编也无不有同感，特别是对于那些由读者选出来的官员更有意见。

《编者与出版人》引用了有名望的报纸评论家爱德华·杰伊·爱泼斯坦刊登在《洛杉矶时报》上的文章说：“水门事件的泄露应归功于报界的说法，从国会听证会肯定下来的事件发展来看，并不能证明这一点。”

大多数记者并不向往做侦探般的活动家或战斗员，甚至连调查研究也不愿考虑。实际上，他们只是想促进市政罢了，而不是什么监督政府。监督政府总归是吹捧政府而告终。虽然美国报界较世界各国的报界达到较高的标准，“美国报界还是失败了”。

真的，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总统乐意怎么回答就怎么回答——有些人称之为控制新闻。驻华盛顿记者团里的有些对峙派原拟使总统难堪的，简直都在那里吃了败仗。记者招待会，与其说是报纸的有用工具，倒不如说成为总统权力的工具了。更糟糕的是，记者招待会已减少到一年只有几次。记者对此提出了责难，尼克松总统在电视中对报界说，人民是根据他的所作所为，而不是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什么来评定他的。

报道面很窄

遗憾的是，公众传播工具的新闻报道面，因受到对新闻的控制、与新闻来源情面难却的友情以及记者人数所限而受到限制。最差的是报道国会、行政机构、法院和州政府。那里的报道重点是争吵与有争议的议案。在本地区，报纸与政

府之间的对峙关系几乎不存在，而那些日报等公众传播工具对于报道市政府或县政府一般是没有多大胃口的。

只有警署新闻是经常的报道内容。此外，在进行零星的竞选报道之后，大选之夜的报道有些做得很出色。我们的商业与社会福利报道极不充分。除了少数情况外，其它报道一般也是浮光掠影的，表面的。

事实上，有心计量一下大多数报纸中的本市新闻或者任何最新的报道，比例之低，使人吃惊。当地采写的新闻，代价是高的。

新兴新闻学*（New Journalism）是怎么一回事？

埃弗雷特·E·丹尼斯和威廉·L·里弗斯首先在他们合著的《其它声音：美国的新兴新闻学》里指出了“新兴新闻学”这个幽灵的特殊形式和意义。他们两人写的对象是美国新闻界的激进分子，可是对于这种激进分子，连他们作者自己也没有什么信心。

据说，新兴新闻记者的色彩、风味、气氛和最终的人情味最好根据构成这种“新兴新闻学”的形式、作法和公众传播工具来看：

- 1、新的非小说体（New non-fiction）
- 2、主张选择的新闻理论（Alternative journalism）

*译注：“新兴新闻学”（本刊第一期曾译为“新集纳主义”）这个词在美国报业史上并不新鲜。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美国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里，美国资产阶级报业大王之一帕利策办《纽约世界报》时也曾用过“新兴新闻学”这个词。帕利策当时进行了报纸改革：主张挖空心思扩大报道面，提倡耸人听闻新闻，进行社会改革宣传，使用花招招揽读者，讲究社论版，大量使用图片，增加篇幅，降低报价，推广发行等等，在美国新闻史上有一定影响。

3、新闻评论 (Journalism review)

4、要有所提倡的新闻理论 (Advocacy journalism)

5、反主流文化的广播 (Counterculture broadcasting)
(译注：反主流文化——指美国国内对现实不满的一种生活态度或持这种态度的人们)

6、主张精确报道的新闻理论 (Precision journalism)
(译注：主张精确地采访与表达的新闻理论)

“新兴新闻学”是什么，包涵什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许多人都认为它与集中的权力背道而驰——它是争吵的、不随和的、破坏性的、不愉快的、不友好的。“新兴新闻记者”要改变新闻报道面，并要接管报社新闻部的行政权力。

新 闻 报 道 的 客 观 性

公共事务分析家路易斯·哈里斯在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合众国际社的编者与出版人会议上说，在他调查的对象中，55%的人赞同这种说法，即各种新闻传播工具的报道是不公正的。这个报告，概括了对应该传播事实的报纸的许多抨击。报告也提出了对我们的新闻学基本原理即客观报道重新进行考察的必要性。

早在1952年，美国战时情报局长埃尔默·戴维斯和另一个广播评论员在《大西洋》杂志上写道：“为了避免一种倾向，客观性常常走向另一极端，以致新闻工作只不过成为假新闻的传声筒了。”

有些印象派的“新兴新闻记者”、“反主流文化活动家”、不满现状的持不同政见者以及有些有名望的记者宣称，客观性在事实报道的新闻里是神话而已，是反动的，不存在的，得不到的。报道一件事，两个人的观察与报道各不相同，

两人之中有一人迟到现场自然更不必说了。

在现实中，完全的客观性是不可能有的。完全客观必然引起对记者和报纸的批评。亲友们对记者也不那样尊敬了。记者可能失业。无怪报道新闻的专门家终究能够在什么是事实上取得一致意见，而引起他们争议的，则是对事实的解释。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分社经理格兰特·迪尔曼在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举行的新闻教育联合会上讲，编者或记者报道这个而又略过另外一个，是十分主观的判断，但是编者和记者又必须这样做。

迪尔曼说，当今报界受到攻击，“不管我们自己是支持或反对攻击，我们总是挨批评了”。他说：

极右分子指控我们企图毁灭现存制度；极左分子则指控我们死保它。我们圆满地一一答复了愤怒党人打来的电话，责备我们时而支持一方，时而支持另一方。还有一位副总统也如此。

在报纸主编联合会举行的一次会上，大多数报人表示在新闻报道中仍将继续坚持老的、难以捉摸的严格地进行客观报道的目标。但是在发言中，有些主编们认为，在报纸工作中，把自己的感情掺入到事件中的新兴新闻记者也可占有一席之地。《华盛顿明星报》主编纽博尔德·诺伊斯说：“我认为，新闻中的主观成份能更引起读者的兴味。”

事实的客观报道

在新闻报道中，严格的客观性怎么会成为美国报纸的典范呢？它又怎么变成责任心的同义词，成为全世界所尊重的美国创造呢？

远在（1860年）美国内战之前，美国报刊，党派性很强，主编个人办报气息很重，政治倾向性很强，是由于它的娱乐性，而不是由于准确性受到尊重。那次战争提出了根据

事实进行客观报道的要求，打从那时起，发展了根据记者站在哪一方面进行客观报道新闻的做法。

到十九世纪末，近代的新闻通讯社成立。弗兰克·诺伊斯和他的美联社同事们体会到要做到说明真相，就是要做到客观。他们认识到，美联社决不可能迎合订用他们新闻稿的各个出版人的各种怪想法。

因此公正地对事实进行客观报道被全世界公认并尊重为新颖的新闻工作，这是一种不亚于发明的美国创造。

为客观报道进行戏剧性辩护的可算彼得·阿内特了。在越战时他任美联社驻西贡记者。阿内特在哈里斯堡举行的宾夕法尼亚洲报纸工作会议中谴责了新闻写作中的能动主义，他认为能动主义是非职业性的。他说：

你怎样保持客观，或者，更进一步，使你写的稿子看来比较明智？你是否尽可能地以职业性的超然眼光进行观察，准确、明白地报道某一景象，那是对你职业修养的一种检验。

……这也许可叫作任务感。为美联社工作，任务感高于战争期间的爱国心，而在国内，它超越于地区性宣传或市政建设宣传之上。假如你不能做到职业的超然，那么你成为在鼓吹什么，想要实现一个有价值的使命，而不是在做新闻工作。

阿内特说，在越南时曾看到房屋被焚，民众死去，但他 不写战争暴行的东西。“我们不下判断，因为我们只是目击者。正如目击盗劫、车祸或谋杀案一样，肯定不由我们去当判审官或陪审员。”他把他的态度归结为“客观”。

阿内特的一个超然事例，《编者与出版人》作了报道：

一天炎热的中午，我站在西贡市场外面。我看到一个身穿棕色服的和尚从出租汽车里下来，蹲在人行道上。和尚接着把橡胶瓶里的汽油撒在自己身上，然后用打火机燃点起来。仅离我几尺之外，面前是个政治殉道者。他的尸体烧成为一团焦浆，发出阵阵恶臭。我感到恐怖和噁心。